

主编 钱锺书 执行主编 朱维铮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

ZhongGuo JinDai XueShu MingZhu



书目答问二种

张之洞 著

陈居渊 编 朱维铮 校



NLIC2970868700

中西書局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

主编 钱锺书 执行主编 朱维铮

书目答问二种

张之洞 著

陈居渊 编 朱维铮 校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目答问二种 / (清)张之洞著;陈居渊编;朱维铮校. —上海:中西书局,2012.9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钱锺书主编 朱维铮执行主编)
ISBN 978-7-5475-0284-6

I. ①书… II. ①张… ②陈… ③朱… III. ①古籍—
图书目录—中国 IV. ①Z8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4622号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

书目答问二种

张之洞 著 陈居渊 编 朱维铮 校

责任编辑 张安庆 李碧妍

特约编审 李国平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17.875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284-6/Z·001

定 价 50.00元

重版前言

朱维铮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十册，于一九九八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为繁体字直排本。现在重版，改由上海中西书局刊行简体字横排本。*

当年由我撰写的初版编者说明，关于编纂过程，交代如下：“这套选编，设计始于一九八八年，由当时主持香港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倡议。编辑设想、编纂方案和拟选目录，均经主编钱锺书先生审订，交由执行主编朱维铮组织实施。”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过程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八年，凡十年，其中必有曲折。我的陈述没有虚语，但说得太简单，刊出后未免引出猜测和议论。

起初有种议论，以为钱锺书先生不可能同意任丛书主编。事实呢？一九八八年早春，我应邀赴北美两所大学承乏客座教席，途经香港，与正在振兴香港三联书店学术出版业务的董秀玉总经理兼总编辑，商讨她年前的一个提议，要我主编一套清末民初思想文化名著的丛书。她同意我用五年编成晚清编三十种的设想，随即由我以主编身份，与香港三联签订了出版第一辑十种的合同。这时董总又提出，为利于丛书在两岸三地发行，可请钱锺书先生出任丛书顾问。

没想到不久董总即告知，她专程赴京，将我起草的晚清编计划面请钱先生审阅，钱先生很感兴趣，并当场删去原拟选陈炽《庸书》一种。

我和钱先生素昧平生，此前在复旦大学曾两度受命筹办中国文化的

学术研讨会，均委托友人代邀钱先生出席，他均未莅临，而我仍将所编《中国文化》及国际讨论会文集寄请他过目。或因此，他对我稍有了解，当董秀玉女士请他担任我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顾问时，竟慨然允诺。这使我很感动，虽在海外辗转数校，仍不断以函电敦请有关专家分担首辑十种的整理校点，自己也编纂较难的几种。

事情往往出乎逆料。大概在一九八八年初冬某日，董总致电给我，说是日前钱先生对记者发表谈话，内谓他已破例同意担任香港三联将出版的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的“主编”。董总深感署名处理为难。我以为钱先生可能记忆偶误，却对丛书在海内外被读者接受有利；至于我的署名无所谓。问题是合同已规定主编应对编纂的稿件负责审定，并撰写每一种的学术性导言，这对年已七十八岁的钱先生可能有困难。其后商定，有关责任仍由我履行。

岂知事情的变化更出意外。我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从德国转道香港回沪，董总谓丛书校点稿排印很快，要求我即写导言，以便陆续出版。不料仅过月余，便发生那场风波，影响所及，香港三联书店也改组。新调任的总经理和总编辑，都表示承认已签合约，但对我相继交付的书稿，包括每种的学术性导言，则于收到后预付合约规定的稿酬外，便搁置不予出版，理由是香港市场小，学术性书籍卖不掉。

怎么办呢？合约未改，我仍算主编，而我在学校勉强恢复教学秩序之后，除了带研究生，便全力逐篇从事导言的撰著。董秀玉女士已回北京三联书店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她关心丛书的出版，港方却答以等我将十篇导言交齐再议。她建议我将已改定的导言，径寄钱先生审阅。我依言寄出拟列为十种首篇的《汉学师承记》导言稿，不久即得钱先生委托杨绛先生代笔的复函，大意谓收到我的“大作”，将留下“学习”云。那信息很清楚，不否认也不承认自己与丛书编纂的关系。这使我想起他为台

湾版《钱著七种》所写的前言，内将他的作品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中的遭遇，称作“表示风向的一片树叶”（《人民日报》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八版），现在是否表明他还要看一看丛书的命运呢？其时约在一九九二年夏季，钱先生已逾八十，风闻他和杨先生都身体欠安。于是我函告董总，表示不再以书稿事打搅钱先生。这是我与钱先生仅有的一次书面通讯，当然此后也无缘识荆。

鉴于我早将十种书稿交齐，香港三联当局仍迟迟不予刊行，因而董秀玉女士遂通过购买版权，将十种改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于是丛书晚清编历经八年磨难，总算提上问世日程。不知董总怎样说服了钱锺书先生，在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仍署钱锺书主编，而我则署名执行主编。奇怪的还有香港三联当局，他们以高价将丛书版权售予北京三联书店，却又附带条件，须将书版交给香港三联，另换封面印港版五百部，就是他们估算的丛书在港台的销量。我对这种“生意经”感到寒心，从此不敢和这班人打交道。

丛书出版后，有位“钱学家”写信命我提供与钱先生的交往情形。我如实答以没有直接交往。岂知此君即作长文痛骂我学识浅陋，所编丛书十种均为劣质品云云。我不得不作文说明丛书编纂实相，建议这位图书馆学者，最好不凭臆测追究他人动机。此后被人称作专写“容安馆毁人录”的这位作者，便视我为仇敌，在所谓揭秘的“大字报”中，会莫名其妙地扯上我，骂我将丛书编坏了，却又不说坏在何处，可谓深悉诬人三昧。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初版三千五百套，早已售罄。十多年来，多有朋友建议重印。钱锺书先生早已逝世。董秀玉女士也已退休多年。我于近年身罹沉疴，于是同意上海中西书局，接受李国平先生的建议，用简体字横排重版印行。

重版必须重校。好在当年参与整理点校的诸位学者,如今均成人文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他们都为承担的成书的重校尽力。李国平先生还关注重版本的编辑发行。当初我撰写的十篇导言,出版后曾得读者商榷,现在除叙事数处略有修正外,余均依旧,至盼读者继续指正。

重排本署名,均依初版,以保存那段曲折历史。当然,仍须申明,全书由我设计体例,选定版本,通审校点,撰写导言,如有讹误不当,均应由我负责。

2011年11月28日三改

* 其中《丛书(初刻本 重订本)》、《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为繁体字横排本。

编者说明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的晚清编,主要辑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文学者的代表性论著,以期展现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异过程。

遴选的学者和论著,着眼于学说有新意,有己见,在思想的文化的或政治的领域,发生过深远的历史影响。

结集则不拘一格,以专题为主,每种或收一人一书,或辑一人多篇,或合不同作者的同题论著为一编。

编者对每种都做以下工作:选择底本,取原校较精的刊本;异本互勘,不偏信通行本或整理本;复核引文,凡原著约引节引而与出典差异较大者均出校记;重施标点,包括分段;编制索引,分人名、书名两类。

编者对每种都撰有导言,附于篇前。导言既重可读性,以助读者了解相关专题的历史实相;也重学术性,当然属于导言作者的一得之见。为行文简明,诸导言凡引证出处、考订史实或商榷疑义,均以附注形式陈述。

限于编校出版的条件,晚清编拟分辑刊行,初定每辑十种,先成先印。如可按设想出齐,当能略见系统性。

这套选编,设计始于一九八八年,由当时主持香港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倡议。编辑设想、编纂方案和拟选目录,均经主编钱锺书先生审订,交由执行主编朱维铮组织实施。

全编原定由两岸三地同时出版,因而版式定为繁体字直排。第一辑早已编成发排,由于种种缘故,长期不克面世。现由北京生活·读书·

编者说明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的晚清编,主要辑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文学者的代表性论著,以期展现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异过程。

遴选的学者和论著,着眼于学说有新意,有己见,在思想的文化的或政治的领域,发生过深远的历史影响。

结集则不拘一格,以专题为主,每种或收一人一书,或辑一人多篇,或合不同作者的同题论著为一编。

编者对每种都做以下工作:选择底本,取原校较精的刊本;异本互勘,不偏信通行本或整理本;复核引文,凡原著约引节引而与出典差异较大者均出校记;重施标点,包括分段;编制索引,分人名、书名两类。

编者对每种都撰有导言,附于篇前。导言既重可读性,以助读者了解相关专题的历史实相;也重学术性,当然属于导言作者的一得之见。为行文简明,诸导言凡引证出处、考订史实或商榷疑义,均以附注形式陈述。

限于编校出版的条件,晚清编拟分辑刊行,初定每辑十种,先成先印。如可按设想出齐,当能略见系统性。

这套选编,设计始于一九八八年,由当时主持香港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倡议。编辑设想、编纂方案和拟选目录,均经主编钱锺书先生审订,交由执行主编朱维铮组织实施。

全编原定由两岸三地同时出版,因而版式定为繁体字直排。第一辑早已编成发排,由于种种缘故,长期不克面世。现由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同时推出。

编者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处参预编纂的年轻同仁，感谢三联书店辛勤校勘的诸位编辑，同时期待高明指正。

编例

一、本丛书选辑十九世纪初至辛亥革命前的部分思想学说名著,每种均由编者予以校勘整理:

底本。以原刊为主,有不同版本者择善而从。

校勘。正底本排校舛误,兼正原作者明显笔误,并以他校核查原著引据正误。一般不作理校。除对校诸本择善而从者外,凡校勘改动处均出校记,以顶注形式见于同页。他校所得亦以校记出之,于正文不作改动。

节录。于篇题下注明,并于篇末注明节录出处。

标点。原刊本无标点或仅有旧式断句者,概施以新式标点。

分段。文言文论著均重分段落,以便读者。

注释。作者原注概从原刊。编者增注限于指出原著有关之人物年里仕宦著述等明显讹误,以顶注出之。

译名。中文译名及译文概从原刊。如原刊注有外文并有讹误,则由编者径予改正。为方便阅读,若干种书未附有新旧译名对照表。新译名均依中国大陆出版物的通行译名。

版式。概用繁体字,直排式。除涉及语言文字学说外,凡原刊古体字异体字,均改为通行繁体字。原作或有双行夹注,现均改为单行夹注。

索引。所选诸种均增编人名、书名两种索引,以便通检。

二、本丛书所选诸种,专著原作者序跋及他人序跋有参考价值者,予以保留,并移作附录。每种前均冠以导言一篇。

一九九六年五月

导言

朱维铮

一

张之洞不是学者。但在晚清后期，在光绪的三十三年间，他却与教育、学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同作于光绪元年（一八七五）的这两部书，《书目答问》和《輶轩语》，便提供了最初的例证。

那一年，张之洞三十八岁，正在提督四川学政任上。两书都是写给本省初学者看的普及性读物。张之洞曾自嘲说，《书目答问》“可作公牒观，不可作著述观”，《輶轩语》则“真是告示公牒一例物事”^[1]。也许他当初自己也没有料到，两书刊行后，很快便突破了省界限制，风行海内，没几年就已有数种翻刻本，包括两书的合编本，在读书家中近于“家置一编”^[2]。尤其是《书目答问》，被一些学者视作可以上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佳制。近二十年后康有为在两广讲学还说，书目“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可常置怀袖熟记，学问自进”^[3]。史学家陈垣直到晚年还承认，他少年时对四书五经以外的学问发生兴趣，即得力于《书目答问》的引导^[4]。

当然，对这两部书的成功，张之洞是很得意的。他在晚年再提及时，便不那么拗谦了，说是当初“撰”此二书教士，“宗旨纯备，于学术源流门径，开示详明，令学者读书，即可得师”^[5]。这又引起一些学者的含蓄不满乃至公开批评。《輶轩语》所设定的读者对象，本来是害怕岁考的秀

才，渴望进学的童生，以及三家村的塾师之类，内容就是如何学做绅士，如何通经读史，如何应付考试，总之是自命钦使的学官教训学生的“发落语”〔6〕。没有学者愿意著文就此同他争论。《书目答问》则不同。当初张之洞虽说它不是著述，却又自负地说，“其去取分类，及偶加注记，颇有深意，即是无数语言，非仅止开一书单也”〔7〕。真是这样么？还有，这部书真是张之洞本人所“撰”的么？

二

张之洞，字孝达，一字香涛，又字香岩，号壶公，又号无竞居士，晚年号抱冰老人，直隶河间府南皮县人；清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生于贵州，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卒于北京。

据说张之洞“天资稍迟钝”〔8〕，但成名很早。虚龄十六，便应咸丰壬子科顺天乡试，中了“解元”，即第一名举人。但由于丁忧、回避等缘故，十年后即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才应会试，中第，却又因殿试对策不守答卷规矩，险被抑置三甲末名，亏得大学士宝鋆推荐，被垂帘听政的西太后拔置一甲三名，循例授翰林院编修〔9〕。从此，这位小个子“探花”，便得到那拉氏格外眷顾，“生平多处顺境”〔10〕。

从十八世纪初起，除顺天学区外，清帝国各行省的典试、提学，渐成翰林院编修、检讨的垄断差使。典试即主持乡试的正副主考官，握有选拔举人权，而中举便意味着跻身于候补文官行列。提学即提督学政，或简称学政，是具有“钦差”身份的行省教育长官，任期只有三年，却在省内诸府和直隶州巡回主持岁考、科考和院试，每处按临两次，以岁考决定生员等级黜陟，以科考决定生员是否具有应乡试的资格，而以院试决定童生能否入学作生员（即俗称中秀才），就是说握有选拔去取地方下

层士绅的权力。因而，翰林院编修不过正七品，检讨不过从七品，但位卑名高，缺苦权重。虽然权重只是可能性，因为要变成现实性，还要看是否有机会被钦点为试差或学差。

张之洞可算翰林编检中的幸运儿。他入翰林院三年，便派充浙江乡试副考官，随即简授湖北学政。任满回京又三年，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再度奉旨派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同时加了“侍读衔”，就是说职称还是编修，冠顶却由白变蓝，官服前后两块补丁上面绣的紫鸳鸯也换成了白鹭鸶，在翰林院可与文六品的侍读平起平坐了。刚试毕，又就地放了学政^[11]。那背后不待说有“帘眷”在起作用。

四川是个大省，当时拥有府州厅县学等各类官学一百五十五所，数量仅次于直隶，居全国第二；但帝国政府配给的学额，即在学诸生的人数，则仅居全国第五，为一千九百一十八人，较直隶少了近千人^[12]。全省生童数呢？张之洞说，他每巡回全省考试一次，就要批阅“浩浩一万四千卷”^[13]。即是说，他主宰着近两千名生员和一万二千余名童生的命运。不“进学”便不能跻身士绅行列，不“在学”便失去了免役特权和小绅士体面。何况生员能否参加三年一届的乡试，去竞争帝国政府配给四川的仅仅六十名^[14]的举人身份，以取得候补文官“正途”出身的初级资格，也必须由学政主持的科试决定。据估计，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使四川绅士家庭人口在全省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由战前的百分之一点二，降至百分之零点六，也就是下降了一半^[15]。这个事实，既意味着各级士绅在乡里地位的提高，也意味着全省文化的普遍水准的大幅度降低。前者无疑刺激一般读书人的功名心，后者则只能导致学风益陋而士风愈劣。

张之洞后来回忆说：“任四川提学时，成都恶习；凡攻讦冒籍、枪替、身家不清诸弊，提调官多置不理；民怨不伸，辄有痞徒，纠众持械，伺于学

使辕门外，待其人复试时，擒去索重贿，名曰‘拉搥’；本生亦雇倩数十健儿为保护，斗于学辕，动有杀伤。”^[16]科场舞弊，已发展到舞弊者和反舞弊者，公然在“钦差”学政的衙门前聚众武斗的程度。风气之败坏可知。

其实张之洞主要批评的还是他以前的历任学政。翰林院本属所谓清水衙门。由鼎甲出身的修撰、编修，由庶吉士即皇家研究生“散馆”后选取的编修、检讨，历科积累下来，往往多至一二百名，职低俸薄，在熬资格的同时，唯盼点试差，放学政，以便去外省弄权捞钱。出售舞弊权，便是生财渠道。张之洞说四川首府的“恶习”，实际上是所有行省的积习。为什么“提调官”——实指学政和监考的地方官相勾结——对于控告应试生童冒充籍贯、雇人代考、隐瞒出身等舞弊行径“多置不理”，就是由于水浑好摸鱼。张之洞在另一则回忆中自夸，“在四川裁革顶充书吏承差陋规两万金，以故风清气弊绝”^[17]，便透露了此省学政相沿成规矩的“合法”贪墨，每任便至少有数万两^[18]。难怪晚清官场讽刺那班自命清要而又盼放学差的穷翰林，道是“一任学政，十年吃着不尽”。

张之洞在翰林院十八年，放过两次考差，两任学政，都没有留下混水摸鱼的记录。这在当时，已属难得。而作为任期只有三年的省教育长官，总有所作为。初任湖北，曾捐俸创办经心书院，再任四川，又与总督吴棠，合倡创办尊经书院，“皆选调高材生肄业其中，成就人才不可胜计”^[19]。所谓不可胜计的效应，虽然可疑，但如尊经书院，出过杨锐那样为戊戌变法殉难的“君子”，出过廖登廷即廖平那样的经学家，宋育仁那样的西方研究者，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以后张之洞历任巡抚、总督，总不忘情于教育事业，到处兴办学校。所办的既有旧式书院，如山西的令德堂、广东的广雅书院、湖北的两湖书院，也有新式学堂，包括西方式的军事学校和各种专科学校，而以在湖北创设的最多。他又热心提倡留学教育，并是清末教育制度改革的主持者。关于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主

张,历来批评的多,称道的少,这里不拟讨论^[20]。但无论是贬是褒,谁若研究晚清教育史和晚清思想文化史,谁就不能对张之洞的活动和主张置诸不理。这一点,更使张之洞在晚清各省如走马灯似轮换的大群庸碌学政中间,成为一名佼佼者。

三

张之洞在翰林院期间曾以“清流”著称,在两广、湖广及署两江等总督任内,又以洋务派知名。从清流党到洋务派,无疑有个转折过程。讨论他的生平和思想,不注意他中年前后政治取向的不同,仅从他个人品格立论,或者从他后半生力倡“中体西用”,来对他一生进行价值判断,固然失诸片面;但如承认他的教育主张前后不同,而以《轺轩语》、《书目答问》二书,作为他在清流党时期的代表作,也未免欠妥。因为张之洞和翰詹同僚宝廷、黄体芳、陈宝琛、张佩纶,以及御史邓承修等,在执政大臣李鸿藻的支持下,“纠弹时政,号为清流”^[21],是光绪五年以后的事^[22]。而张之洞在光绪二年十一月已离四川学政任^[23]。

事实上,同治十三年十月,张之洞就任四川学政,那时他入翰林,虽已九年,但那时帝国执政大臣内部,由于文祥竭力周旋调解的缘故,还没有分门别户^[24]。因而张之洞自以为是在替帝国整体利益服务,便可理解。

轺轩语,直白就是“天子使者的告戒”。书名已规定了说话的对象与限度。如前所述,学政的权力所及,主要是本省的诸生和童生。所谓诸生,不论是拿地方政府津贴的廪膳生,虽无奖学金而有定额的增广生,或者是初入官学而等待升级的附学生,都属于帝国政府所认可的“士”。他们虽然还不像高一层的举人贡生那样,已具有初等候补文官的资格,

却享有与这种身份俱来的若干特权。可以穿着缘青的蓝绸长袍,可以免缴人头税并免服杂差,可以见官不跪并免受官刑,可以参与地方宗教的或公益的事务,可以成为家族的当然代表乃至首领,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考试或捐纳晋入候补文官的层次而获得更大的特权。诸如此类,都是童生所没有的。因此,诸生和童生,同属于“生”,即所谓儒者,在仍然存在中世纪的等级身份制的晚清,实际上分属治人者和被治者两大类。童生通不过学政主持的院试,只好终身做“白丁”。张之洞从来重视身份和等级。他把已有初级绅士身份的诸生,作为首要说教对象,是很自然的。但他也很清楚,由于他中解元到列鼎甲的顺遂,由于他握有进退士绅身份的权柄,因而那些渴望博取一袭青衿的童生们,将更会视他的“告戒”为“举业指南”。这就是《轶轩语》叙目强调正文三篇语多浅近的缘故。张之洞还以为这三篇,“中人以下及乡塾童蒙未能遽领”,又附录“别说二十四条,告教授初学者”^[25]。这更是直接指点学做帖括诀窍和进场规矩。

然而全书并非“科举考试指南”。正文三篇,“上篇语行,中篇语学,下篇语文”^[26]。其中只有下篇真在讨论如何做“时文”以应付程试,旨在帮助“良材困学”在场屋中不致因犯规犯忌而被黜落^[27]。张之洞虽是两榜出身,但对科举考试却没有好感,身任学政而奚落八股,在湖北任内已如此^[28]。即在本书附录也可见。首篇教童生习做八股,篇题却用了颇含调侃意味的“学究语”,以示他“在官言官谊”而无可奈何。

中篇所谓的“学”,便撇开了相沿八百年的帖括之学,而大谈应该通过读四部书而增进学问,逐一列举阅读经史子集的门径,甚至不厌其烦地列举可读的版本目录。尽管他也说“为学忌分门户”,“读书期于明理”以及“致用”,实际介绍的却是清代汉学家读书治学的常识。谁都知道,清中叶吴皖两派汉学家的宗师惠栋和江永,都终老于诸生。从科举